

國寶資料更新—— 以北宋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為例

■ 余佩瑾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北宋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和明宣德寶石紅釉僧帽壺，均是 2019 年文化部正式公告為國寶級的文物。這兩件作品同時也是目前南部院區「皇帝的多寶格」展之展件，本文以其中之一青瓷無紋水仙盆為例，除了更新學界的研究論點外，也擬透過作品附件的梳理以及流動於檔案中的相關資訊，從中演繹一則國寶文物傳世的驚奇之旅。

所謂「水仙盆」

如果回到文物未遷臺的年代，由於 1933 年的《故宮周刊》曾經刊出青瓷無紋水仙盆（圖 1），並且以「宋汝窯水仙盆」為名，¹ 而讓筆者以為至遲從那個時候開始，汝窯青

瓷器中的同類器型均被看成是「水仙盆」。但是，「水仙盆」畢竟燒製於宋朝，因而令人好奇，到底宋人是如何看待宋朝製造的「水仙盆」？最近有學者認為周密《雲煙過眼錄》中的「鳴盆」講的正是水仙盆。² 周密（1232-



圖 1 | 北宋 汝窯 青瓷無紋水仙盆（故瓷1785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298) 的書約莫完成於 1296 年左右，那個時間點無疑比今天更接近汝窯產出的時間。書中描述一間開在大街上的古玩店，店主曾經轉手過幾件質地「甚佳」的汝窯器，其中一件即為「鳴盆」。因「鳴」字有口歪不正的含意，而讓當今學者將敞口橢圓形器身的水仙盆看成是古人筆下的「鳴盆」。³

另外，青瓷無紋水仙盆全器無一絲開片紋路，幾近完美的程度，又令人想到明人曹昭《格古要論》「汝窯」條下綜整而出「有蟹爪紋者真，無紋者尤好」的鑑識準則。⁴由於，《格古要論》再版於 1459 年，因此似可再將青瓷無紋水仙盆視為是自十五世紀以來，即備受人們關注、追蹤的一類產品。即使以生產製作的角度著眼，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汝窯窯址出土的標本多數帶開片，僅有少數

幾個例證除外，⁵故能印證曹昭的觀點，不帶開片紋路的汝窯，誠屬難得。再加上過去因受限於出土材料的不足，原本大家以為水仙盆器是汝窯單一個窯口的獨創器型，但近年來隨著資訊不斷公開以後，終於大家也見識到定窯和南宋官窯亦相繼出產水仙盆器，⁶進而可將水仙盆看成是宋朝官樣的一種。

附件材料

青瓷無紋水仙盆傳世過程，曾經經過清朝乾隆皇帝經手收藏並重新加以包裝，因此作品本身至少增加了三個值得留意的附件。今天我們通過對附件材料的梳理，無論如何都有助於釐清古人的鑑賞觀，同時復原水仙盆在清宮陳設的樣態。首先，關於器底鐫刻的御製詩（圖 2）。該首詩題名作「獨食盆」，



圖 2 | 北宋 汝窯 青瓷無紋水仙盆底部（故瓷1785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收進詩集的時間為乾隆二十六年（1761）。如果這個時間點可以作為完稿時間參考的話，那麼乾隆皇帝加註於詩名之下「實宋修內司窯器也，俗或謂之太真獨食盆，戲題」的注腳，充分說明他當時的確認為青瓷無紋水仙盆是宋朝的瓷器，不過礙於身邊好事者莫不拿楊貴妃的寵物盆來比喻，讓他下筆受到影響，於是附庸風雅地使用一種模稜兩可的口吻，寫下「官窯莫辨宋還唐」，在一種猜不透唐宋的氛圍中，更藉著「龍腦香薰蜀錦裾，華清無事飼康居」兩句，描述唐朝宮廷豢養哈巴狗的軼事，所以才自我解嘲為「戲題」。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附件是隨器傳世的木座（圖3），細觀之，整體木質表面精勾細描出纏枝花葉紋，而且每一道紋路都再填入金彩，在紫檀木色映襯下，輝映出無比華麗的視覺效果。除此之外，座身另外潛藏一個開闔自如的抽屜，裡面珍藏一本乾隆皇帝《御筆書畫合璧》冊（圖4），具體反映出皇帝經手典藏的史實。該本冊頁裝裱成書與畫間隔出現的形式，前後共鈐蓋「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圖5）、「太上皇帝之寶」和「養心殿寶」等五枚璽印。內容依序為乾隆皇帝〈臨宋蔡襄與大姐



圖3 | 汝窯 青瓷無紋水仙盆木座（故瓷1785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 汝窯 青瓷無紋水仙盆之木座及內藏《御筆書畫合璧》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尺牘》、〈摹元趙松雪寫生小幀〉、〈臨宋蘇軾晦夫推官帖〉（圖6）、〈偃松圖〉、〈臨宋黃庭堅書與庭誨帖〉、〈御筆畫梅〉、〈臨宋米芾題褚摹蘭亭跋贊〉和〈摹蘇軾枯木竹石〉。

其中〈蔡襄與大姐尺牘〉和〈黃庭堅書與庭誨帖〉均為三希堂法帖收錄的作品。而宋米芾〈題褚摹蘭亭跋贊〉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宋蘇軾〈晦夫推官帖〉則見於明人李日華《六研齋二筆》及清人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的著錄。⁷儘管最後一件作品目前僅見文本記載，但從乾隆皇帝實際加以臨摹的作為中，不難理解其原屬清宮舊藏的可能性。

至於繪畫部分，第一幅蘭草圖（圖7），畫面右上角乾隆皇帝自題「趙松雪寫生小幀，頗得空谷無人之美，此擬其意」，款落「御筆」。無論佈局、筆法，均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引首題「妙香靜契」，本幅畫蘭草的作品雷同。⁸第二幅〈偃松圖〉，畫面左下角乾隆皇帝自題「或謂似東坡偃松，或謂仿北鎮



圖5 | 「八徵耄念之寶」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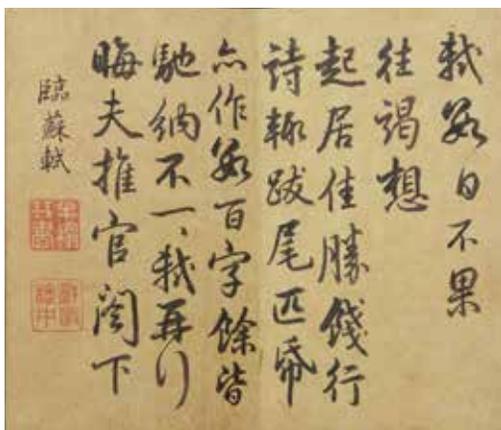


圖6 | 清高宗 臨宋蘇軾晦夫推官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 清高宗 摹元趙松雪寫生小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 清高宗 偃松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廟前古致」，畫中從右向左斜出的虬枝老松（圖8），若對照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收藏的另一幅御筆蒼松圖，而可從構圖相似的松樹，理解兩張畫作出自同一作者的可能性。⁹ 進而藉由史丹福大學本畫上題跋，追溯出所謂北鎮廟前的古松，竟是皇帝東巡途中偶然看到的景致，而讓他一再描繪追憶的原因，究竟是因為鮮少出門的緣故，還是另有其他隱情，時至今日，已無法追溯。不過類似於此，在一本迷你版型的《御筆書畫合璧》冊中，猶然一次性地收錄日常臨摹、學習宋元名家書畫手跡看來，乾隆皇帝必然

如同他的鑑賞璽印「幾暇怡情」所言般，提調文物和品鑑觀覽絕對是日程不可少的項目。進而得以梳理出，他理應非常重視這件青瓷無紋水仙盆，並視之為文化形象的表徵，否則不會降旨將御筆書畫與古董珍稀並置收藏。

檔案著錄

對照檔案著錄，除了能夠將青瓷無紋水仙盆及其包裝附件，一路上溯至事件的始發點之外，也讓我們見識到名品並非孤伶伶的傳世，它們通常是宮殿陳設組件的一部分。以下依照時間的近遠序列，簡單說明如後。即透過1961年出版的《故宮瓷器錄》（以下簡稱《瓷器錄》），而可發現當時將青瓷無紋水仙盆命名為「宋汝窯天青無紋橢圓水仙盆」，並附註文物遷臺後的盤點紀錄為「帶木座，內附乾隆御筆書畫一冊」。以此為基礎，再透過青瓷無紋水仙盆本身「呂」字1804分號47的典藏號，檢視1925至1926年清室善後委員會的清點紀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以下簡稱《點查報告》），又發現當時的品名作「冬青磁洗」，附件有「帶木座，木匣座有乾隆御銘，座內有御書畫合璧一冊」。通過前後兩份紀錄除了得知院藏文物的品名，在不同年代有不同說法外，兩份出版品對木座的描述，亦存在些許出入。依照現狀，青瓷無紋水仙盆隨附的木座因帶抽屜，固然可以對照《點查報告》將之視為木匣座，可是該木座底部無刻銘，則和「木匣座有乾隆御銘」的敘述不相符。

由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水仙盆中，三件隨附有木座（故瓷17851、故瓷13977和故瓷17790，另兩件見圖9、10），其中一件口嵌銅釘的汝窯青瓷水仙盆（故瓷13977）所



圖9 | 北宋 汝窯 青瓷水仙盆及其木座（故瓷1397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 清 仿汝釉青瓷水仙盆及其木座（故瓷1779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 | 北宋 汝窯 青瓷水仙盆木座底部（故瓷1397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附木座，底部確實刻有「靜憩軒御賞」銘識，款識前後並有「清玩」和「比德」、「朗潤」三枚璽印（圖 11）。然而，該件作品通過「雨」字典藏號的提示，得知係屬紫禁城重華宮舊藏，和本文關注的青瓷無紋水仙盆無關，故間接暗示《點查報告》亦有筆誤之處。

同樣依據《點查報告》顯示出來關於青瓷無紋水仙盆和其他物件共組「多寶格」的線索，得以再透過「呂」字代表養心殿，¹⁰回溯養心殿陳設檔案，而爬梳出青瓷無紋水仙盆係為清嘉慶七年《養心殿東暖閣博古格陳設》（1802）中的一個物件。同時對照其於清單中的紀錄，從「官窯盆一件」下面有「口

缺釉，紫檀木描金座抽屜內，御筆書畫合璧一冊。上刻詩」的附記，首先因所記附件與實物相同，而可研判當時名為「官窯盆」的器物，即指青瓷無紋水仙盆而言。但是「口缺釉」一點，倒是提醒我們青瓷無紋水仙盆不如想像中的完美。對照實物，因缺陷位於口邊，又極小，所以不太為人所留意。（圖 12）不過最重要的是，經由陳設檔資料的比對，足以說明《點查報告》登錄為「呂」字 1804 號項下名為「多寶格」的 125 件文物，至遲於嘉慶七年以前，其實陳設於養心殿東暖閣，且擁有「博古格」之組名。

時光流轉中的陳設變化

如果這個推論成立，還可以進一步就文獻材料發現幾個相關的面向；特別因侯怡利在文章中已指出院藏「呂」字 1790、1804、1846 和 1847 等號項下文物於嘉慶七年之際，均陳設於養心殿東暖閣，然而至清道光十九年（1839）卻一改前例，轉登錄至西暖閣陳設檔。¹¹ 在此基礎上，為了進一步釐清其間的轉折變化，筆者逐逐條比較兩個年份的物件清單，結果發現：

（1）儘管這組文物從嘉慶七年到道光十九年，有從東暖閣移動至西暖閣，且經重組陳設的變化，但整體除了少部分文物有所異動外，其基本組成大致沒變。但登案方式前後略不相同，如嘉慶七年是以物件品名作為主體，即在「漢玉圖章一方」下，附注「雕紫

檀木匣上刻詩、上刻詩」，但至道光十九年，相同的物件則改以包裝匣盒為主體，所以轉成「雕紫檀木匣一件（上刻詩，內盛漢玉圖章一方）」的登錄方式。

（2）少數異動的現象，有如嘉慶七年登錄在案的「青花白地蒜頭瓶一件」，至道光十九年時，不知何因已被置換成「均釉磁瓶一件」。而嘉慶七年仍在組群中的「漢玉龍尾觥」，至道光十九年則遭刪除（或漏記）。相對於此，另外透過黏貼於檔案上的黃籤，又見識到包含「蜜蠟腰圓盒一件（內盛漢玉安期澡一件）」在內共計九組件的文物，均陸續被道光（1821-1850）、咸豐（1851-1861）和同治（1862-1874）等三朝皇帝取走不再復歸原位。除此之外，明朝宣德官窯出產，傳世僅見一對的霽青和霽紅刻花蓮瓣紋滷壺（圖



圖 12 | 北宋 汝窯 青瓷無紋水仙盆（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 | 明 宣德 霽青刻花蓮瓣紋滷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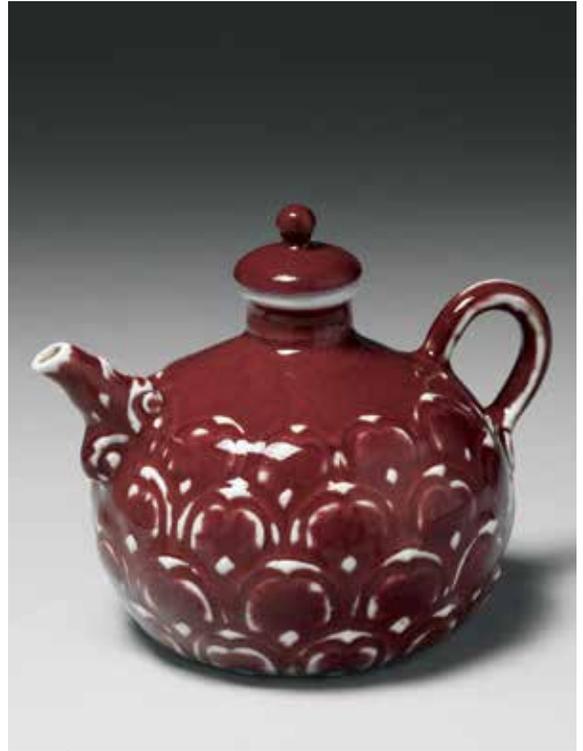


圖 14 | 明 宣德 霽紅刻花蓮瓣紋滷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 | 明 宣德 霽青刻花蓮瓣紋滷壺底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 明 宣德 霽紅刻花蓮瓣紋滷壺底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3、14），很意外地在嘉慶七年的檔案中被登錄成「成窯」作品（成窯霽青磁蓮花酒壺一件、成窯霽紅磁蓮花酒壺一件），至道光十九年才重新修訂為「宣窯」。事實上，該兩件作品底部均存在青花「大明宣德年製」款（圖 15、16），而且據說景德鎮窯址亦曾出土類似的標本，¹² 所以毫無疑問當為宣德官窯產品。由此反映出，陳設檔因登案時間點非常接近文物組成的時刻，因而被認為具有一手史料的參考價值，可是登案過程中，卻又因書記人員或不完全瞭解文物，所以也不排除有需要加以重新校正之處。

（3）關於文物位移狀況，透過一件同為「博古格」組件的錯金銀瑞獸尊亦可窺見相關端倪（圖 17）。該件作品隨附木座及清宮黃籤，木座兩面均陰刻填金款識，其中承物面刻「乾隆御賞」（圖 18），底部則為當時給定之「漢瑞獸尊」品名（圖 19）。而黃籤上「商金銀異獸雙喜花插，係博古閣北面北閣內，交出長座子畫樣，准時再做」的文字（圖 20），除了說明該件文物係屬「博古格」組合物之外，「北面北閣內」的陳設位置，和嘉慶七年檔案標記為「南面東第二格」，以及道光十九年移至「西邊西面格」的狀況均不同。坦白講，在黃籤未有明確時間記錄下，我們其實也無法瞭解其間的差異，究竟是因為管事人員用以採記的方位基準點有所不同，還是三則訊息其實代表三個不同的位置。

〈鑑古圖〉軸的關聯

又由於博古格同時收納青瓷無紋水仙盆和寶石紅釉僧帽壺的視覺意象，令人聯想起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十二美人圖系列作品之〈鑑古圖〉軸，進而引發博古格收納的文物是否

即為〈鑑古圖〉畫中所見的問題（圖 21）。關於此，參照北京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楊新的研究，而可瞭解十二美人圖系列作品可能是雍正皇帝未登基前於潛邸主導繪製的一組特殊畫作，無論背後的意圖是否如同楊新所言，雍親王胤禛意欲借用文學上的「香草美人」隱喻，說明自己與世無爭的心態，出現於雍正十年（1732）《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中關於「圓明園深柳讀書堂圍屏上，拆下美人絹畫十二張」的記載，無論如何也反映出畫作完成的時間，除了楊新文章推論的康熙五十一年至六十年之間（1712-1721）之外，至遲於雍正十年前，該系列畫作確實裝置於圓明園深柳讀書堂中。¹³

那麼畫中之物究為何？儘管畫中的水仙盆和院藏青瓷無紋水仙盆極其相似，但實物附件已爬梳如上，截至目前為止，並未見有和雍王府相連的蛛絲馬跡。倒是另一件同樣神似畫中物的明宣德寶石紅釉僧帽壺（圖 22），其傳世狀況一如《瓷器錄》的記載，隨附一個木座和一個用以收納器蓋的錦套（圖 23）。木座承物面並且直刻一行「大和齋製」款，款未落「迪德」印（圖 24）。反面則刻乾隆皇帝〈題霽紅僧帽壺〉御製詩，詩後有「乾隆乙未仲春月御題」的紀年款識，並鈐刻「比德」和「朗潤」兩印（圖 25）。乾隆乙未為乾隆四十年（1775），因此顯示此品得到乾隆皇帝交辦御題的時間，和該首詩收進詩文集的時間完全相同。不僅如此，木座周緣以「雍邸清玩」為記，亦與御製詩有所呼應。

亦即比較僧帽壺及其附件和《點查報告》的紀錄，可見現況與報告所錄「帶蓋，



圖 17 明~清 15~18世紀 錯金銀瑞獸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 明~清 15~18世紀 錯金銀瑞獸尊木座「乾隆御賞」
(刻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 明~清 15~18世紀 錯金銀瑞獸尊木座「漢瑞獸尊」(刻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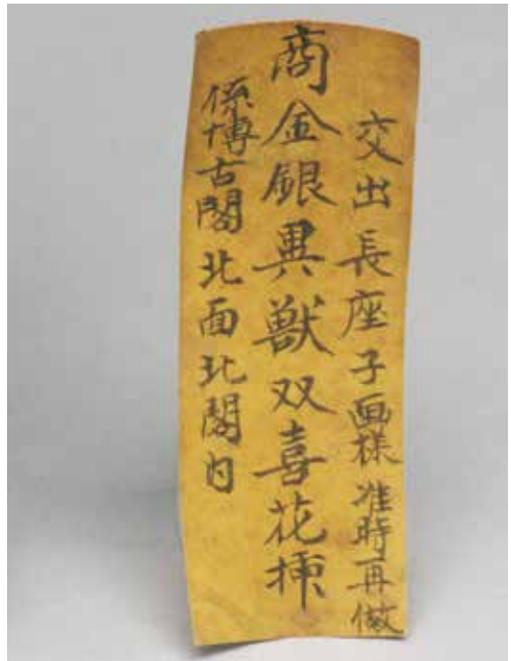


圖 20 明~清 15~18世紀 錯金銀瑞獸尊 隨附黃籤 國立
故宮博物院藏

蓋帶套，套有玉扣帶，木座底刻乾隆御製詩」完全相符。即使回到嘉慶七年的陳設檔，也能從博古格清單將之登錄為「霽紅僧帽壺一件」，並附注「紫檀木座，上刻雍邸清玩，上刻詩，座上刻詩，錦套一件」的附件說明，梳理出寶石紅釉僧帽壺於十九世紀初期的包裝樣式，一直傳留至今日的情形。緊接著檢視器底與木座兩面刻題的文字，又可得出與〈鑑古圖〉軸相關的訊息如下：首先，乾隆皇帝〈題霽紅僧帽壺〉的第一句「宣德年中

冶，大和齋裡藏」，已清楚說明該件宣德官窯原來屬於「大和齋」收藏。那麼大和齋位於何處？御製詩後面的注腳又解釋了，所謂「壺底鐫雍邸清玩及大和齋製，蓋皇考在藩邸時所鑑賞，大和齋今在雍和宮」，原來是乾隆皇帝的父親雍正皇帝未登基前的居所所在。此點遂能回應楊新的研究，將寶石紅釉僧帽壺視為是〈鑑古圖〉的畫中物。

此外，就筆者目前眼力所及，這組「博古格」的藏物中，另有兩件作品也同樣擁有「大和齋製」款識的木座。其一為獸耳扁壺（圖26），這件作品的木座兩面均有款識，其中承物面刻「大和齋製」款，中間落一「迪德」印（圖27）。底面刻「周獸耳扁壺、雍邸清玩、乾隆御賞」和「遁齋」印（圖28）。對照〈鑑



圖21 清 十二美人圖 鑑古圖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趙廣超、吳靖雯著，《十二美人·1·一卷美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13。



圖22 明 宣德 寶石紅釉僧帽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 明 宣德 寶石紅釉僧帽壺蓋錦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 | 明 宣德 寶石紅釉僧帽壺木座（正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 | 明 宣德 寶石紅釉僧帽壺木座（反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古圖〉軸，此物像極了美人身旁桌上之物。另一件玉馬體型較小（圖29），雖然單就畫面的佈局來看，未見陳設其中的影像。但從木座承物面先依器型淺挖凹槽，再刻「大和齋製」款（圖30），底面又刻乾隆皇帝詠〈玉馬〉御製詩（圖31），而可鏈結前述寶石紅釉僧帽壺和獸耳扁壺，說明無論「博古格」組成的時間是否與〈鑑古圖〉成畫的時間相當，可上溯至康熙朝。但從文物隨附木座顯示出來的訊息，至少可以追溯出寶石紅釉僧帽壺、獸耳扁壺和玉馬等三件文物原來係屬雍正皇帝雍和宮的收藏。而且從其個別木座均刻「大和齋製」款識，也可研判木座或製作於雍王府，後再經乾隆皇帝降旨重新加工的可能性。

木匣座的製作時間

如上所述，本院共藏五件水仙盆，其中三件皆個別隨附木座，但因帶木座的三件水仙盆中，一件是清仿品，雖然仿品亦有其值得討論的面向，然因文章篇幅有限，以下則僅針對兩件帶木座的汝窯，加以爬梳相關的問題。這兩件汝窯，一件是無紋水仙盆，另一件即為上文提過，珍藏於重華宮，口嵌銅釘的水仙盆。對照乾隆朝《活計檔》的紀錄，而能追溯出它們獲選配製木座的可能時間。

當我們穿越時空，回到乾隆十年（1745）「五月初一日」那一天，可見「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汝釉貓食盆一件（隨茜紅牙座、一面玻璃楠木匣子），（傳）旨將貓食盆另配一紫檀木座，落矮些，足子下深些，座內安抽屜」。原來皇帝想為一件「汝釉貓食盆」製作一個全新的紫檀木座，那麼這件「汝釉貓食盆」和本文討論的青瓷無紋水仙盆有何關聯呢？此點如同前面講過般，

乾隆二十六年左右，皇帝身旁的人都告訴他，水仙盆俗稱「獬食盆」，而犬字邊的「獬」字，已為現代學者蔡鴻生考證出是指「哈巴狗」而言。¹⁴ 儘管如此，又該如何理解「貓食盆」和「獬食盆」以及水仙盆的關聯呢？關於此，可再通過乾隆三十七年（1772）完成的另一首「詠官窯盆」御製詩來解惑。亦即，我們在這首詩中先讀到乾隆皇帝以和十二年前相似的觀點發表：「官窯原出宋，貓食卻稱唐」，然後針對所謂「貓食盆」，自己又下了註腳說明：「俗稱此器為唐宮貓食盆，然大內今已有三，識為宋官窯製也」，由此可見，乾隆皇帝筆下的「貓食盆」，其實就是乾隆二十六年所稱的「獬食盆」。最後當該首詩也實際鐫刻到北京故宮清仿汝釉水仙

盆的底部（圖 32），則具體地反映出無論「貓食盆」或「獬食盆」，都是指水仙盆一類的器形。再者，皇帝所言「大內今已有三，識為宋官窯製也」，則說明他至少曾降旨御題三件汝窯水仙盆。

回歸配座一事，因同一則記事於文末有「於八月十一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汝釉貓食盆一件，配得紫檀木漱金座，座內安得抽屜，盛磁青紙摺，隨一面玻璃楠木匣持進安在博古格內」¹⁵ 的結案報告，而顯示歷經三個月後，博古格貓食盆的專屬木座終於製作出來。後來，到了「十一月十四日」那一天，「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博古格內汝窯貓食盆一件（隨描金紫檀木座），多寶格內汝窯貓食盆一件（隨紫檀木座蓋嵌玉頂



圖 26 | 秦漢 獸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7 | 秦漢 獸耳扁壺木座（正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8 | 秦漢 獸耳扁壺木座（反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9 | 清 玉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0 | 清 玉馬木座（正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各隨一面玻璃楠木匣）。傳旨：將多寶格內貓食盆，照博古格內貓食盆座樣放高一寸配座，亦安摺子」。¹⁶ 這則記事透露皇帝看到另一件貓食盆時，又想以博古格為範例，再幫多寶格的貓食盆配製同等級的木座，在火速降旨交辦後，「於十二月二十三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原樣貓食盆一件，汝窯貓食盆一件，配得木座隨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終於多寶格貓食盆的木座也製作完成。

上述訊息與本文的關聯，可以分成幾個層面來看，首先乾隆朝的宮廷分別存在各自命名為「博古格」和「多寶格」的文物組合，

而且其中均收納有今日稱為水仙盆的物件。特別由於博古格組，無論名稱和時間點均和嘉慶朝陳設檔的紀錄非常接近，而讓筆者將收納其中的「汝釉貓食盆」看成是目前所知傳世唯一的無紋水仙盆。另外，由於該件「汝釉貓食盆」提出之際，登載具有「隨茜紅牙座、一面玻璃楠木匣子」的附件，除能據以回溯至乾隆三年（1738）皇帝上手鑑識的「汝釉貓食盆」，從同樣具備「隨象牙茜紅座、楠木環玻璃匣一件，玻璃有破處」的包裝形式，比對出兩者可能即為同一件文物外，當乾隆皇帝因見「玻璃有破處」，隨即降旨「楠

木匣上另換玻璃」為之重新整理，隨後也詳細記錄「象牙座內安磁青紙摺子，簽子寫博古格小字，寫雍正己酉集成」，敘明貓食盆的來源，¹⁷則又反映出即使院藏青瓷無紋水仙盆目前除了圖像資料外，並無其他線索可以直接連到〈鑑古圖〉軸，但透過《活計檔》的資料，無論如何也可將之上溯至雍正七年（1729）的宮廷陳設。

其次，若以檔案描述「照博古格內貓食盆座樣放高一寸配座」的設計點，來觀察傳世所見三個木匣座，確實可從中發現帶「靜憩軒」銘的木座，具有高度稍高的特色，而不免產生聯想，以為該件木匣座或即為檔案所言，刻意加高製作的木座。如果這個推論成立，那麼多寶格中的貓食盆應該正是院藏口鑲銅釦的水仙盆。對此，除能透過靜憩軒

位於漱芳齋，曾是乾隆皇帝讀書之處的線索，在乾隆十年的《活計檔》記事中發現皇帝降旨為漱芳齋命名、懸掛匾額的經過外，透過道光十九年《漱芳齋現設陳設檔》登錄一筆「官窯銅鑲口盆一件（有缺，紫檀木描金座，上刻靜憩軒御賞），抽屜內《御臨樂毅論一卷》、《御筆書臨遠山一卷》」的資料，¹⁸也能追溯出目前空無一物的木匣屜，原來亦貯存皇帝日常臨寫的習作。

再者，撰文過程意外發現的檔案記事，也側錄了乾隆皇帝不時改裝多寶格組合的面向。此情形如同乾隆十一年（1746）的記事所言，皇帝降旨以比照「多寶格樣款」，另外組合一組古玩木格。當我們檢視太監提出的文物，可從中發現一筆「汝窯鑲銅口貓食盆一件（隨手卷二卷）」，這批文物在皇帝



圖 31 | 清 玉馬木座（反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2 乾隆仿官釉水仙盆。取自馮先銘、耿寶昌主編，《清盛世瓷選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頁352。

的要求下，一律需要配製木座和玻璃楠木匣，其中無木座者，均需逐一重新配製，當所有的文物均經檢視完畢後，貓食盆因已有木座，故只需「刻字或填金青綠字，要紅寶」，完成後即隨著「紫檀木鑲字畫小格一座，內裝古玩，持進安在靜憩軒內訖」。¹⁹由於目前

所見「靜憩軒」銘木座底部之「靜憩軒御賞」五字（見圖 11），均填入青綠色的顏料，而其前後三枚璽印也以硃砂增強能見度，凡此皆可對照檔案記事的內容，故能進一步追溯出鑲銅釦水仙盆木座刻銘的時間，以及物與座又隨同其他物件重新集裝、陳設的樣貌。

無論宋製或清仿品，凡附木座的水仙盆，其木座內均貯藏御筆書畫，此現象除了顯示乾隆皇帝一再把玩鑑賞外，對照鈐蓋於「靜憩軒」銘木座之「清玩」印，又可從康熙皇帝《庭訓格言》以為古董瓷器僅可作為清玩、陳設之用的觀點，反過來思考乾隆皇帝一再重裝汝窯水仙盆的目的。

作者任職於本院本部

註釋

1. 此處所言，僅指汝窯而言，並未涉及清同治年間燒製的水仙壺。《故宮周刊》的報導見《故宮周刊》合訂第 13 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 年復刻），頁 644。
2. 「又汝窯壺一、瓶二、鳴盆一，甚佳」，見（宋）周密，《雲煙過眼錄》，卷 1，頁 2。取自「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電子資料庫。
3. 小林仁，〈北宋汝窯青磁水仙盆に関する考察〉，《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北宋汝窯青磁水仙盆》（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6），頁 143。雖然如此，我們也無法忽視，形不正的鳴盆也有可能是指花口水仙盆。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寶豐汝窯博物館編者，《夢韻天青——寶豐清涼寺汝窯最新出土瓷器集粹》（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頁 70-71。
4. （明）曹昭，《格古要論》，卷下，〈古窯器論·汝窯〉，頁 1。取自「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電子資料庫。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址 2000 年發掘簡報〉，《文物》，2001 年 11 期，頁 4-22。
6. 南宋官窯水仙盆例證見小林仁，〈北宋汝窯青磁水仙盆に関する考察〉，頁 138-151。定窯水仙盆例證見路杰，〈新發現的定窯橢圓形四足水仙盆標本〉，《文物天地》，2019 年 1 期，頁 100-101。官樣問題見謝明良，〈高麗青瓷紋樣和造型的省思——從「原型」、「祖型」的角度〉，《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7 期（2019.9），頁 72。
7. 筆者辨識御筆書跡過程，得到書畫處何炎泉科長許多協助，特此申謝。
8.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花卉寫生卷》見 Zhang Hongxing, *The Qianlong Emperor: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Edinburgh: NMS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88-89.
9. Chuimei Ho and Bennet Bronson, *Splendor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 The Glorious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London, New York: Merrell, 2004), 268-269.
10. 嵇若昕，〈故宮文物的 ID〉，《故宮文物月刊》，272 期（2005.11），頁 80-91。
11. 侯怡利，〈從〈博古格〉看乾隆皇帝的文物包裝〉，《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 230-253。
12. 承蒙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前所長告知，誌表感謝。
13. 楊新，〈《胤禛圍屏美人圖》探祕〉，《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 年 2 期，頁 6-23。
14. 蔡鴻生，〈哈巴狗源流〉，《中外交流史事考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頁 163-171。
1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3，乾隆十年五月初一日〈江西〉，頁 708-709。
1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乾隆十年十一月十四日〈珽郵作〉，頁 96。
1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九月初四日〈廣木作〉，頁 384。
18. 道光十九年《漱芳齋現設陳設檔》，收入《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冊 16，頁 238。
1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4，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七〈祿作〉，頁 600-601。

多寶格

皇帝的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2019/12/25
to
2021/12/26
SUNDAY WEDNESDAY

二〇二〇 展廳 201 GALLERY
61248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
No.888, Gugong Blvd., Taibao City, Chiayi County, 61248, Taiwan R.O.C

Tel: +886-5-362-0777 <https://south.npm.gov.tw/>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URIO BOXES OF QIANLONG EMPEROR